

“九一八”事变

~奉天总领事
林久治郎遗稿



2

也平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K264.2

2

2

九一八事变

~奉天总领事
林久治郎遗稿

王也平 译

邹念之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B

419332

“九一八”事变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

王也平 译

邹念之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抚顺教育印刷厂印刷

字数：12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frac{7}{8}$ 插页：2

印数1—24,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 骏

责任校对：李晓晶

封面设计：安今生

统一书号：11371·6

定价：1.60元

译者前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近年，人们从总结教训、维护和平的愿望出发，正在认真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国人民一向关注，成为那次战争最早策源地的东方法西斯日本，以及它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已是国内外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

从前，一般仅将“九一八”事变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侵略我国的一个严重步骤；至于它同其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却很少论及。今天我们则已从世界战略全局的高度，通过纵横考察和比较研究，可以看清它在世界历史发展坐标上的客观位置及其深远的影响了。这是因为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史家摆脱了时代局限，而有关文献资料也已多半披露于世。

研究任何史事，只有全方位的充分掌握资料，并进行立体多维的综合动态研究，才能认识它的历史本质及其意义。现在提供给读者的

林久治郎的“遗稿”，就是研究“九一八”事变较为罕见的日本方面一种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奉天总领事是当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急先锋，身居如此冲要地位的林久治郎之“遗稿”，在他死后经人整理于一九七八年以《满洲事变与奉天总领事》书名出版，曾在日本史学界和一般公众之间引起相当强烈反响；但我们必须注意，它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用侵略者观点写下的东西，应予严正批判。然而另一方面，“遗稿”毕竟是在广阔历史背景上，记载“九一八”事变前后这段中日关系史的秘录，从中人们可以窥见事变的来龙去脉和阴谋内幕。它从对立面角度记叙的东北地方政府的对日态度，特别是多处详述的张学良将军的言行，给人们留下了一幅绘声绘色、难于亲见的侧面写照，则颇可正人视听、发人深思。即或作者对其政府、军部的种种评论，虽然无非是侵略集团内部之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策略分歧，但这在认识日本外交行径、研究日本政治历史也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林久治郎悻悻然被调离奉天转驻巴西，但未过几时就又从日本外交舞台上消声匿迹了。这表明日本法西斯在其无限扩张，妄图称霸世界的时期中，竟疯狂到连林久治郎、币原喜重郎之类主张以荫蔽、较缓和的手段向外侵略的人物，都不能被见容了。这种历史阴影之在日本的长期存在，想就是该书之所以必然成为“遗稿”的一个原因。

译者曾拟请全国政协常委王家楨先生审阅译稿、惜只在北京医院会晤王老一面，不久这位在书中多次被提到的史历见证人竟阖然长逝了。现在唯愿对“九一八”事变前后这段历史最具权威的张学良将军得以早日见到译书了。

译者还要特做说明的是本书的译译，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邹念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并不惮烦劳为译稿进行精心的校勘，使之臻于信实。在此谨深致谢忱。

本书在译、注的过程中，虽曾谨慎从事，力求留驻原貌；然以水平所限，纰漏之处恐亦难免，敬希期界学人和广大读者惠予指正，以期史事流传不失真实。

王 也 平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武汉

校者赘语

校完全稿，思绪怆然，聊赘数语。本书篇幅并不很大，但却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史事和颇为难得的史料，它揭开了一段历史奥秘，在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凡关心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们，一读此书，当不致感到索然乏味或因虚耗时间而失悔。

本书原文是笔记式的记述，文字未加修饰，而且用的是与现代日语稍异的较古的文体，译起来难度匪小，译者王也平同志之所以不畏繁难，遂译此书，是源于他的爱国赤诚以及对这段史事钻研的学术热情；我之所以支持他从事这项劳作，并接受了校核全书的委托，也并不止于某种单纯的责任感，而是想使我国这段历史的内幕能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以激发青年同志的爱国心，同时也期望通过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到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当年的一个真实侧影。

张学良将军的政治生涯虽很短暂，但曾叱咤风云，在我国现代史上发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他一生可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东北“易帜”，使广袤富饶的东三省复归于祖国的怀抱，

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吞我国东北的企图；另一是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其错误主张，坚决抵御外侮，从而促成了内战的暂时消弭。接着，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号召下，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最终导致了全民抗战的胜利。在这段历史过程中，张学良的业绩是不能抹煞的。

关于这两大史事，战后国内外均有不少资料相继发表，而目前我国对于国外资料的掌握似乎还不够充分。本书作者林久治郎，是“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曾参与幕后活动并首当交涉之冲，对于事变的前后经过知之甚详。他以亲身经历留下的这本记录，在他生前并未准备，恐怕也自知不可能公开出版。此人笔下记述的有关我国的史事，特别是张学良将军的所言所行，自必更有其揭隐发微的效用，其史料价值，当可不言而喻。

今年恰好是“九一八”事变的五十五周年和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我们抚今追昔，自不能不缅怀当年那些曾为国家民族含辛茹苦和流血牺牲的历史人物，而仅以“而立”之年，却能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张学良，恐怕更令人不能忘记。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将军迄今仍在台湾过着怆凉的幽囚生活。张将军若能得睹此书，恐亦难禁昂首长叹！

行笔至此，不由衷心翘盼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邹念之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从曼谷来奉天·····	1
二	济南事件·····	12
三	张作霖被炸事件·····	21
四	南北妥协问题·····	31
五	解决悬问案题的交涉·····	43
六	东三省易帜·····	58
七	中国的“革命外交”·····	76
八	在满朝鲜农民问题及其他·····	90
九	万宝山事件·····	108
十	中村大尉事件·····	118
十一	柳条沟事件·····	128
十二	满铁·····	141
十三	离去满洲·····	150
十四	满洲国·····	162

附 录:

- 一、林久治郎简略年谱
 - 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职员名单
〔昭和6年(1931)年6月〕总领事
 - 三、日本驻奉天(今沈阳)总领事馆历任总领事官名单
 - 四、本书有关历史时期的日本内阁一览
 - 五、本书有关历史时期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及满铁总裁名单一览
-

一 从曼谷来奉天

昭和三年（1928年）二月上旬，当我正在曼谷留连于当地热带风光的时候，突然接到外务省的急电召我回国；同时，出渊（胜次，后任驻美大使——原文注，以下均此）次官^①又以另电告知，政府要派我移驻奉天，希望我能曲意承诺。我驻节暹罗^②将近二年，此间已经进行了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在这正待今后逐步推行的时候，遽然受命离开这个驻地，心里实在觉得十分遗憾。然而考虑到对华外交原是自己要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而且这又是政府的命令，遂决定在当月下旬离开曼谷，于三月中旬回到了东京。

返抵东京之后，首先去会晤次官，随后晋谒了大臣，外务大臣是由总理大臣田中（义一）^③大将兼任的。他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进踞北京自称大元帅的张作霖等人对我国的态度日趋恶劣，他们不仅要阻碍我国在满蒙的发展，而且还有威胁我国既得权益的倾向，留居该地的我国官民对此无不愤慨。因此，政府的意向是满洲^④问题一定要在本届内阁任期内给

予解决。昭和二年（1927年）初夏，内阁刚一成立，立即召开了如所周知的东方会议^⑤，但其后的工作却一直未能顺利地开展起来。于是政府考虑需要进行人事调整。准备派我去接替吉田（茂，后任过首相）继任驻奉天总领事^⑥。另外，政府已将关东长官^⑦儿玉（秀雄，伯爵）^⑧转任朝鲜政务总监，而由同田中首相关系深厚的木下谦次郎继其后任。至于主管南满铁路的人事安排，早在昭和二年（1927年）六月，就以政友会^⑨的骨干（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⑩为主，松冈洋右^⑪为辅，坐镇在那里了。

我认为我国在满洲的发展情况如何，是关系到日本帝国兴衰的大问题。日俄战争时期的满蒙，原本是个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区，没有什么象样的产业，与中国关内各省相比的确是贫穷落后的地方。直到我国取代帝俄经营南满铁路以后满洲才开始走上开发的道路。尔后，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地方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如今一变已成为最富饶的宝库了。尽管这种异乎寻常的发展，是由于我国派驻了满铁守备队^⑫维持地方治安，并投下庞大资本致力于产业开发所带来的结果；但由此得到最大实际利益的却是中国，直接受惠的则是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间接也影响了中国内地各省的发展。反过来再从我国这方面来看，满铁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扩充膨大，但以日本的战略全局而论，其发展的步子却颇为迟缓，与中国相较，几乎是不成比例的。中国人在农商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到处呈现出一派殷实繁荣的景象；而日本人则仍然踟躇于铁路附属地^⑬之内，甚至情况竟发展到这样令人泄气的地步，即连日俄战争之后曾一度勇敢地深入到某些内地的日本人，又不得不陆续跑回附属地来了。究其原因，固然有我国同胞对情况估计不足的因素，但是满洲的中国官宪一味策划收回利权，明里

暗里阻碍我国官民的活动确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来对于中国官宪的如此行径，只要我方的对策没有错误，再加上我们拥有相当的实力，排除上述干扰使他们没有捣乱的余地，那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然而遗憾的是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方的对策却不能说是尽如人意、符合理想的。

盖我国之于满洲，经济开发方面有满铁，对外交涉机关有各领事馆，掌握附属地行政权的有关东厅^⑭，此外还有兵备精强，且由多数雄心勃勃之将校为骨干的关东军^⑮。这些机关，理应一体接受我国政府的指挥和监督，然而事实上它们的方针却往往互不一致。正因为这个原因，致使我国历来在满洲的工作屡遭失败，其例不胜枚举，对所谓“四头政治”的谴责就是由此引起的。为纠正这一弊端，曾有人提出过统一机构的主张。大正六年（1917年）寺内（正毅，陆军大将、元帅）内阁就曾制订过这种计划，任命陆军中将中村雄次郎为满铁总裁兼关东都督，并企图将驻满洲各地的领事移管于关东都督府，但因为遭到外务省官员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当时我正在济南，对于寺内的方案，我认为他在主观上是想克服二重外交，但实质上却反而促成了二重外交，故亦曾表示反对；但在另一方面，统一在满洲的机构确有必要，因而在内心里对寺内首相的魄力倒还是钦佩的。军部一向唐突蛮干，屡屡惹起事端，终致失败；而“霞关”^⑯则较为消极，优柔寡断，常为他人先发所制，总是在事败之后出来收拾残局，并且没有毅然奋起一扫上述弊端的勇气。简单说来，这种弊端的根源就在于“霞关”对内对外都过于懦弱，军部又过于强横，致使象满铁和关东厅这样的机关也都想插手于外交事务了。

如上所述，我国政府各机关的步调互不协调，对方即中国官宪对此间的消息也比较灵通，他们密切注视着我国政府内部

的意见分歧并积极加以利用，使得我们的目的总是不能达到；连古来所说的恩威并施的策略，也未尝取得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军部与拥护军部的一派激愤于中国方面接二连三地不讲信义，经常倾向于采取强硬政策；与此相反，外务省当局则总为应付一切善后工作在忙忙碌碌，徒然贻人以愚拙无能之嫌。

我既然要挺身前去满洲，就应该排除这些干扰以自主地去推动工作，也就是说，必须革除所谓“四头政治”的弊端。

“四头”之中最有力量的是军部，只要能够封住陆军使其不得干预外交，则其他的障碍就都不在话下了。幸好，首相是在军部还保有相当威望的田中大将，我遂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先从内部调整一下步调，然后再着手于满洲问题的处理。我首先想使政府树立起这样一个原则，即军部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外交事务，非经奉天总领事同意军方不能与任何中国官宪进行外交活动。我将这个意见整理成简要的书面材料，提请出渊次官设法交付内阁会议讨论。次官表示把它转交给大臣有些为难，但由于我的坚决请求，最终还是将它转上去了。

当时外务省的政务次官是政友会的议员森恪^{①7}，他反对我的要求。森恪向我讲了一套歪理，说什么“政友会内阁不存在二重外交，如果接受了你的要求，岂不就等于承认本届内阁存在有二重外交了。”我当即反驳说：“这可不是那种政友会云云之类的小问题，……。”然而，终归还是没能列入内阁会议的议程，只是在后来得到了白川（义则）陆军大臣的签署，使他在我起草的上述文件上盖了印。足见当时的田中首相作为军人虽然已经是预备役，但在军内还是保持着相当势力的。可是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后任首相）竟最后又在这份文件上加了一个附笺，写上一条“凡属于军务问题不在此限”的批注。显

然这可以看作是陆军幕僚对该文件不满情绪的一种表露。

时光荏苒，在磋商这些问题当中转眼就到了四月，我本来还打算再进一步与外务省以外的其他有关方面碰碰头，而满洲竟发生了洮昂路货车问题。这是去年、昭和二年（1927年）张作霖不顾我方几次抗议，修筑的京奉路打虎山站与四洮路支线终点站通辽相联结的一条铁路，早于当年年末竣工，并于昭和三年（1928年）春季已与四洮路接轨。而这时他们又计划将建设年限尚浅、货运量较少，以我满铁贷款建成的洮昂路上的货车，转用到客、货运输频繁的沈海路上去，并准备利用新近通车的打通路来调运这批货车。洮昂铁路虽然说属于中国政府管辖，但是尚未向满铁偿付工程费用，理应在建成后将工程费用转为贷款的合同也还未签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那些货车仍然是属于满铁所有的。现在，他们想经由我方几经抗议的那条与满铁并行的打通路，把这批货车调到与满铁竞争的沈海路上去加以利用，对此我国官民均认为极其无理而异常愤慨。峰谷（辉雄）代理奉天总领事曾为此提出强烈抗议，并与在当地的满铁首脑及其他人等相呼应，几乎要爆发一场重大冲突，形势十分紧张。其时，满铁总裁山本正在东京，他去年曾到北京与张作霖进行过铺设满洲五条铁路的交涉，现正在东京指挥其在北京的代表继续推进工作；我国政府也恰在准备以新的阵容处理此案，对那种不待中央指示而激昂愤慨起来的、在满同胞的狂热气氛有所顾虑，所以急需我早日赴任妥予处理。这样，我遂决定将那些尚待充分商谈的问题暂时搁置一下，先行赴任，一俟看到实地情况后，再根据需要返京磋商。

当时在中国，随着山东、河南形势的紧迫，张作霖在关内的地位逐渐频于危殆。在这种急回直转的局势下，张作霖仓皇逃归东三省的事态随时都可能发生；再加上我有前述的种种急

务，就决定迅速整装迳赶任地。四月二十二日匆忙自东京启程，一路奔向奉天，二十五日抵达。二十四日晚车经安东县时，在约一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里，受到几十名居留官民有志者的热烈欢迎。席间，我听到了满洲居留民所谓强硬政策的第一个声音。这些有志之士竞相呼吁：必须趁此时机以断然态度解决满洲问题。二十五日到达奉天时，又受到多数官民的迎接。这个地方到底是满洲的中心，气氛显得更加严峻。蒞任之初一时会客较多，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充分交谈，但他们大多数都表现出激昂的情绪，期待着满蒙问题的断然解决。其中有我陆军特务机关^⑮的秦(真次)少将，奉天省政府的军事顾问土肥原^⑯大佐(贤二，后任大将)。后者是我多年的知交，又是中国通，于是我特别利用二十六和二十七两天晚上，同他们两人就时事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他们两人的意见是，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历来很不驯顺，有必要趁此时机从东三省把张铲除，而另以他人代之；总参议杨宇霆是张作霖手下权势极盛的人物，他对日本也一直持不恭顺的姿态，尤其是去年以来他的排日态度更是不能容忍的，故对杨也必须在这时与张作霖一同除掉。当说到用何人来代替张的时候，他们两人都认为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最为合适。张氏父子和杨宇霆，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这三人中，谁最亲日、谁最反日还需要极其慎重地加以考察。当然，张作霖历来的对日态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近年来杨宇霆的排日言行也决不可等闲视之。然而，以张学良所受的教育及其思想来看，我觉得与其说他倾向日本倒不如说他更倾向欧美。如果因为张作霖和杨宇霆的对日态度不好，而要打倒他们另以张学良代之，则不能不顾虑这是否会带来俗话所说的“前门防虎，后门引狼”的那种更坏的结果。我认为在对华问题上若采取因人而异的政策那

是非常危险的。我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坚定不移，特别是对东三省，一定要采取无论什么人当权都坚决不变的一贯方针。对于东三省的当权者，只要与我国协调的即予以支持，否则即不支持，必须以这种方针对处；至于张作霖、杨宇霆或是张学良，三者中哪个人掌握政权，并不是我们所要过问的，危险的则是根据特定人物制定政策。现在感到张作霖不行，杨宇霆也不行，因而决定拥立张学良，这种搞法是不够妥当的。尽管我剴切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但土肥原基于已往的成见，似乎总不肯放弃其除掉张作霖、杨宇霆的打算；至于秦，他对中国问题的知识本来很肤浅，只因有土肥原的意见在他头脑中先入为主，因而也总是怀有必须确立某种特殊政策的急躁情绪。尤其是他在表面上打着王道的旗号，却又坚持一种反动的方向，看来使他理解真正的对华政策是有困难的。然而就现实的东三省而论，倘若张作霖在关内与国民军作战而败退归来，则关外^②秩序即有立即陷于混乱的危险。到那时，在满洲拥有特殊权益的日本究竟应采取何种态度，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并做好充分准备。我当即意识到，就维持东三省的治安、保护我国权益应持的态度问题，向政府提出具体建议是当前刻不容缓的急务。经过同上述两人的反复商讨，最后认定：如果张作霖为国民军击败而要逃回东三省时，为维持东三省的治安起见，应不允许他逃回关外，这是扼制国民军不许其进入关外所必须采取的坚定方针；假若连这一点都允许的话，东三省即将变为中国内乱的战场，治安无法维持，而我国权益就有蒙受损害的危险了。因此帝国政府必须及早确定方针：或者使张作霖不与国民军接仗平安无事地撤回关外；或者俟其败退时断然不许他逃回东三省，两者必择其一。基于这种认识，我决定提出建议敦促政府及早明确方针。于是，于四月三

十日向本国政府拍发了有关电报。

注

- ① 次官，日本职官名称之一，辅佐大臣掌管本省事务，监督所属部、局工作。通常有政务次官和事务次官之别。本书有关的职官称谓均按原称照译。
- ② 暹罗即Siam，东南亚地区泰国的旧称。
- ③ 田中义一（1864. 7. 25—1929. 9. 28）日本帝国主义军人、政治活动家。长州藩士出身，后入陆军。日俄战争时以满洲军参谋身份参战。战后历任陆军省要职。1918年为原敬内阁陆相时，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十月革命；192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再度入阁为陆相。成为山县有朋死后陆军长州军阀的头目。1925年以大将退役为立宪政友会总裁。1927年在经济危机中组阁为首相兼外相、拓务相。对外主张强硬的侵略外交政策，他曾强行出兵山东，主持“东方会议”干涉中国革命，攫取在华权益。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制造“三·一五”及“四·一六”事件，镇压日本共产党。在内外反对声中因皇姑屯炸车事件，其内阁被迫总辞职，政友会总裁换班时猝急而死。
- ④ 满洲，指我国东北地区。《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部族条，“按满洲本部族名…，固章章可考也。”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硬以满洲这个族名来代替东北这个地区名称，是在蓄意篡改历史。
- ⑤ 东方会议（1927. 6. 27—7. 7）是田中内阁讨论并决定积极侵略中国方针的会议。在出兵山东的同时，在东京召集外务、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及驻中国外交官参加的秘密会议。初由森格外务政务次官同陆军少壮将校协商，统一使“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的认识，最后会议由田中训示《对华政策纲领》。在策略上明确为“确保在满蒙特殊的地位权益”，必须决心维持满蒙的治安；贯彻“满蒙分离政策”，先应促进满蒙铁道建设问题的解决，着手进行铁道交涉；在中国内部谋求支持国民党而镇压共产党；确立以武力保护现在“居